

陆仰渊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百色起义与 龙州起义



百色起义与龙州起义

陆 仰 渊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周同宝
封面装帧 诸铨疾

百色起义与龙州起义

陆仰渊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兴隆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 字数 141,000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700

ISBN7-208-00355-6/K·92

定价 3.15元

序 言

魏宏运

百色这个美丽的名字，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为人们传颂着，自邓小平、张云逸等共产党人1929年在这里领导起义开始，它就和革命和民族精神联系在一起，曾有许多人写文章和回忆录，歌颂这里的人民，歌颂起义的决策者，论述起义的历史意义，使百色这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更具有魅力。现在陆仰渊同志以历史学者的眼光写出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实是一件喜事。

陆仰渊同志在广西博物馆和广西社会科学院工作期间，对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的工作又赋予他以便利条件，阅读了有关这两次起义的历史文献，并深入左、右江地区，访问了上百名红七军、红八军的老同志，获得了第一手资料。他已编辑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40万字，198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以此为基础，经过几年的探索与推求，对这段历史作了有价值的研究。

大革命失败后的几年是工农起义烽起的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指引下，共产党人选择了适当的时间和地点，经过准备，在不少地区点燃起不灭的火焰，唤起民族的觉醒，反抗国民党的反叛。百色

起义即为当时震撼西南边疆的一次起义。

地处桂滇黔三省交界的百色，和靠近越南边境的重镇龙州，属广西左、右江地区，在这里聚居着的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深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苦难，群众有强烈的反抗精神。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韦拔群曾领导这里的农民组织农会，开展农运，实行土地农有。人民对共产党有深厚的感情，这就是所以选择在百色举行起义的一个原因。1929年蒋桂战争频繁，生灵涂炭，桂系内部的矛盾重重，给发动起义以良好的机会。种种因素的复合，把人民愤怒的激情汇集在一起，导入一个方向，集中于同一个目标——革命。作者正是从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出发，探讨起义的主客观因素，展示了起义决策人邓小平同志的智慧和才能，以及怎样得心应手地创造出英雄业绩。

邓小平，当时名邓斌，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后，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达广西，他知道如何动员社会上各种力量加速革命的进程，他紧紧依靠广西党组织和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省绥靖司令李明瑞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俞是反蒋人物，舆论界说他“向来左倾”，“其左右都是那些左倾或共产党分子”。可见当时革命势力的发展，已影响到广西政权，使其倒向革命。这一倾向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形成了极大的威胁，蒋遂大加讨伐，俞败走香港，李明瑞则按邓小平的指引，进入左江。张云逸率领一支部队到右江，和韦拔群等联合，张开了赤色的旗帜。由张云逸任红七军军长，俞作豫任红八军军长，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邓小平为总政委，革命声势大振。1929年12月27日《申报》曾

报导了这一起义的历史进程，“李仍盘据两江，化名张超，在百色龙州一带，组织苏维埃政府，实行共产。”

这部书叙述了百色和龙州起义的全过程，分析了当时的历史社会条件，记录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生气勃勃的斗争，以及红军离开广西转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后，黑暗又重新笼罩两江的历史。本书对起义的一系列实践和理论问题，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也接触到以往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

历史研究总是应该给人以启迪，给人以聪明和智慧，不单是为了记述过去，回忆历史。人们会从这部书得到有益于自己的东西。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距今已近六十年，百色起义纪念日也已被定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纪念日。1988年适逢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书是很有历史意义的。

1987年12月15日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为在南部边疆发动武装起义

作准备	1
第一节 国内与广西的形势	1
一、国内形势	1
二、广西的政局	4
三、广西的社会经济状况	6
四、广西的工农运动	9
第二节 党为在广西发展组织和掌握军队而	
努力	17
一、第一次蒋桂战争后的俞作柏政权	17
二、为扩大广西党组织而努力	19
三、掌握军队的策略	21
四、恢复广西的农民运动	25
五、武装起义方针的确定	26
六、俞、李反蒋失败后党的应变措施	30
第三节 转向左右江，为起义作准备	34
一、转向右江	34
二、在右江的革命措施	36

三、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的建立·····	41
四、左江的开辟工作·····	42
五、邓小平对左江工作的布置·····	44
六、平息蒙志仁的叛乱·····	46
七、对左江部队的改造·····	49
第二章 百色起义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52
第一节 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的诞生·····	52
一、百色起义和红七军的成立·····	52
二、右江苏维埃政府的建立·····	61
三、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64
第二节 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67
一、党加强对右江根据地领导的措施·····	67
二、平息土匪骚乱·····	69
三、地方赤卫军的整编与扩大·····	70
四、根据地的组织建设·····	71
五、群众组织的建立·····	72
六、其他各项建设·····	74
第三节 根据地保卫战·····	78
一、隆安之战·····	78
二、马鞍山战斗和亭泗狙击战·····	81
三、盘阳会议·····	82
四、奇袭榕江·····	84
五、根据地军民的反烧杀斗争·····	88
六、光复百色·····	90
七、伏击滇军和平马整训·····	93

第四节 土地革命·····	95
一、土地革命方针的确定·····	95
二、武篆会议和土地革命试点·····	96
三、《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	99
四、土地革命的铺开·····	105
第三章 龙州起义和左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108
第一节 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108
一、中共左江特委和红八军党委的成立·····	108
二、龙州起义和左江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111
三、红八军的政纲·····	113
四、左江革命根据地·····	115
第二节 巩固左江革命根据地的措施·····	116
一、整顿内部·····	116
二、镇压反革命·····	117
三、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干涉·····	119
四、平息黄飞虎叛乱·····	121
五、邓小平对左江工作的指示·····	122
第三节 左江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124
一、龙州失陷·····	124
二、红八军余部转战桂南·····	126
三、红八军第一纵队转战到右江·····	130
四、左江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133
第四章 开赴湘赣根据地·····	136
第一节 “左”倾冒险主义对右江的影响·····	136
一、前委对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争论·····	136

二、《前委通告》第六号	141
三、错误的“反富农路线”	143
四、红七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和河池整编	146
第二节 战斗在桂湘粤赣边	149
一、东进柳州	149
二、进军湘南	151
三、“左”倾冒险主义的中止	152
四、桂岭缩编	154
五、梅花村战斗	156
六、分兵战斗在赣南、湘东	157
第三节 红七军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和兴国会师	160
一、红七军第二次党代表大会	160
二、王明“左”倾错误对红七军的危害	162
三、兴国会师	164
四、肃反运动和李明瑞牺牲	166
第五章 右江军民的反“围攻”斗争	168
第一节 红七军二十一师的组建和第一次反 “围攻”	168
一、红二十一师的组建	168
二、右江军民粉碎桂军的第一次“围攻”	173
第二节 右江独立师的改编和第二次反“围攻”	179
一、右江独立师的改编	179
二、外线游击	180
三、粉碎桂军第二次“围攻”	181
四、杀奸团的组建	184

五、开辟新根据地	185
六、中共右江特委发布《为时局告群众书》	186
第三节 韦拔群、陈洪涛牺牲和右江根据地的丧失	188
一、桂军对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攻”	188
二、反“悬赏”斗争	190
三、韦拔群、陈洪涛壮烈牺牲	191
四、革命烈火继续在燃烧	193
结束语	196
大事纪要	198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为在南部边疆发动武装起义作准备

第一节 国内与广西的形势

一、国内形势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前夜，中国革命的形势正经历着剧烈的变化。自1927年国民党“分共”以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各阶层人民的革命统一战线破裂了，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密切联系的大资产阶级篡夺了国民党的领导权，民族资产阶级成了他们的附和者；原来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工人、农民，成了他们的敌人；而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却成了他们的同盟者。在革命者血泊中建立起来的南京国民政府，尽管取代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却依然代表着城市官僚阶级和乡村地主阶级的利益，继续出卖政治、经济、文化等权益，换取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它的支持，以其左手对付革命力量，以其右手对付其他各派的军事、政治力量。于是，反革命战争和军阀间互相混战，先后迭起。

但是，南京政权并不稳固，在国民党内部蒋介石与汪精卫、胡汉民等之间的矛盾在日益加深。当武汉的汪精卫联合

唐生智率军东进，北洋直鲁联军反攻南下之际，蒋介石曾一度被迫“下野”。1928年爆发的李宗仁、唐生智之战，开创了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先例。随着桂系击败唐生智，他们的势力扩展到两湖，蒋桂矛盾日益加深，又为1929年爆发的第一次蒋桂战争埋下了根子。周恩来在论述当时的形势时指出：“中国政局自蒋桂、蒋冯战争后，表面上蒋系的南京政府得了胜利，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加大了些，但实际上一切引起战争的矛盾并未解决，且日益加深地向前发展，因此反蒋的军阀混战又由酝酿至于爆发。”^①

中国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②从1927年下半年到1929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就是利用这样的时机，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创建了红军和一批革命根据地，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表明了革命已经渡过了最困难时期，形势正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

中国革命从城市转向农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出来的。因为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下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革命的主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1页。

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买办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是铲除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和推翻其走狗封建地主官僚买办阶级的统治。但中国革命的敌人相对地比较强大，他们不仅有外国帝国主义作为靠山，而且长期占领着中心城市，控制着全国的政权，握有一支强大的反革命武装和全国的经济实力。而革命本身，由于中国是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相对比较薄弱，“革命力量就非在长期间内不能聚积和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地战胜敌人的力量。因为敌人对于中国革命的镇压是异常残酷的，革命力量就非磨练和发挥自己的顽强性，不能坚持自己的阵地和夺取敌人的阵地。……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也就决定了。因为我们的敌人不给中国人民以和平活动的可能，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的政治上的自由权利。”^①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是党在敌人的屠刀面前，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一次尝试。这两次起义的结果表明，革命要立住脚跟，不是在城市，而是在农村。“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7页。

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党在农村中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在农村中发展革命力量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党在农村中发展革命力量和建立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客观现实决定的规律。这是因为：

1. 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是个经济落后的地方。
2. 中国农村幅员广大，革命势力有回旋余地。
3. 中国的反革命营垒内部不统一，充满着各种矛盾和斗争，农村是反革命统治的薄弱环节。

4. 农村有着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他们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又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因此，中国革命的中心从城市转向农村不仅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自广州起义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就比较注意把革命力量逐步移向反革命力量比较薄弱、又是大革命时期发生过革命或受到其影响的地方。广西正是具有这样的条件，于是就成为广州起义后革命力量转移的一个方向。

二、广西的政局

自辛亥革命以来，广西就被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军阀所霸占。1920年9月，孙中山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组织五路救粤军，向旧桂系发动讨伐。结果，旧桂系在广西长达十年之久的统治宣告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为首的新桂系。1926年，新桂系参加了广东革命政府的北伐，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在北伐军攻占上海、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8页。

南京后，桂系害怕革命深入，和蒋介石合谋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并参与了对南昌起义军的镇压，因而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取得了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28年，蒋介石一度“下野”，李宗仁分别击败了孙传芳和唐生智，控制了广西、两湖和沪宁等地，把其重心移向长江流域。当蒋介石复出后，桂系已成为其主要的政治对手。桂系在扩张其军事、政治势力的同时，仍把广西看作其向外扩张的基地。所以它在广西推行的一套政治、军事和经济政策，都具有其独特的一面。

桂系在广西的政权具有明显的新军阀特征：地方政权依附于其军队，成为为军队服务的一个工具；县、区、乡各级政权，是封建地主豪绅与军阀势力相结合的产物，地主、豪绅与官僚、政客结为一体，依靠军队的势力控制地方，鱼肉百姓；军阀势力对地方建设和百姓痛痒从不过问，广西人民毫无民主权利可言。尤其在以壮族为主的瑶、汉、侗、苗等多民族杂居的桂西山区，仍保持着许多自宋代以来推行的“土司”制度的残迹。尽管桂系明令废除“土官”制，改设了县、区、乡、保各级政权。但这些县、区、乡、保长仍是由土官变来的。1926年，东兰县长陈勉恕在《广西东兰农民运动之实际状况》一文中说：“东兰是一个土州，从前土官——土皇帝——当然在封建制度上具备无上的权威，这种政治权力改变之后（改土归流），谁都知道县长绅士土豪是一个承袭者，人民之被压迫如故”。^① 广西农民部长陈协五说：“而绅董沿袭土司遗制，更常擅用私刑，以武断乡曲”。^② 1926

① 广州《农民运动》，第22—23期。

② 广州《农民运动》，第6—7期。

年秋，东兰县地主豪绅勾结百色军阀刘日福部的龚寿仪团，在东兰县的武篆、长江、东院等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兰农惨案”，杀害农民一百四十多人，勒索现金九万多元，抢去牛马二千四百六十七匹，损失财产数百万元。这是军阀政权严重迫害农民的典型例子之一。共产党人韦拔群等把当时广西的政治归纳为“军阀争夺地盘，政客互夺饭碗，官僚专铲地皮，绅士争食弱肉，田主掠夺农民，富翁盘算贫者，饥荒死人，到处皆是。”^①这是当时广西政局的生动写照。

三、广西的社会经济状况

落后的政治制度，给广西的经济带来了破坏性的灾难。民国以后的二十年间，广西的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发展。清末在贺县开办的西湾煤矿，在军阀混战中被破坏，井口淹没。1918年，在迁江县合山（今合山市）开办的迁善公司，十多年间仅采掘了二千多吨褐煤，以后就倒闭了。散布在柳州、南宁、桂林和梧州等地的工业，也只是些小型的农副产品加工工业，如制糖、榨油、造纸、火柴、织布等行业，规模狭小，技术落后，很少有机操作。都安、隆山、那马等县，在清末盛产纱纸，有槽口（即作坊）二千多座，年产纱纸五千担以上（每担八千张），曾远销南洋等地。到1920年，由于“洋纸”倾销，日趋衰落，产量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整个广西的工业生产总值不及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而在广西经济中占主要地位的农业生产，也处于非常落后的状况。

当时，广西的人口八百多万，拥有耕地一千多万亩。但仅占广西总人口百分之三至五的地主，却霸占了一半以上

^① 《敬告同胞》。《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第127页。